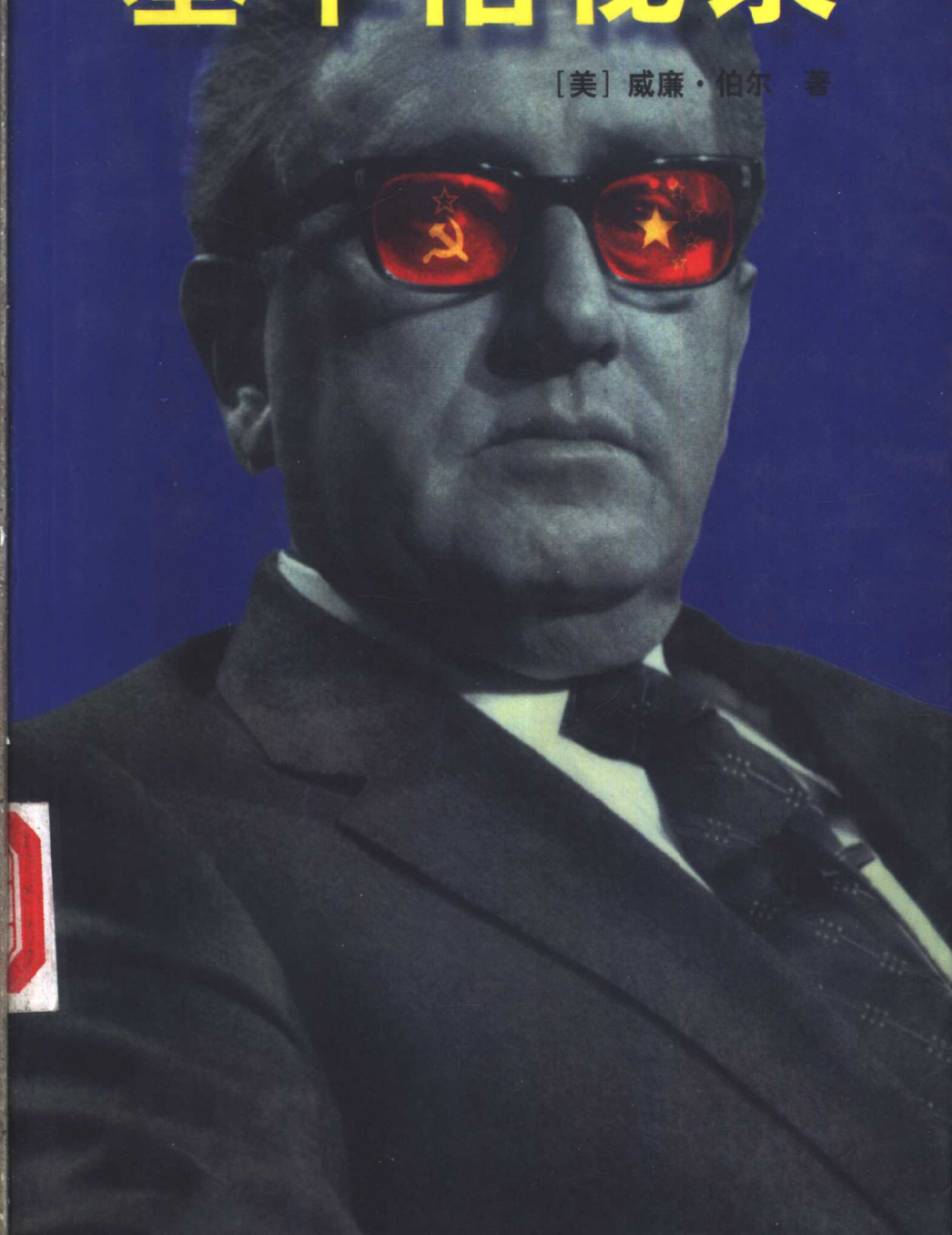


THE KISSINGER 基辛格秘录

[美] 威廉·伯尔 著



责任编辑：亦夫

封面设计：艺术

《基辛格秘录》是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最重要的冷战记录之一。在它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三角外交的裸露的关节处、雄辩的毛泽东、咆哮的勃列日涅夫以及亨利·基辛格的多重个性。所有这些都由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威廉·伯尔作出了专家评注。

帕特里克·E·泰勒，前《纽约时代周刊》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经过二十年不自觉地依靠主人公有时是出于个人目的回忆录，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手的文件，这可以让我们重新来更严格地评价那些动荡的年代和重大的决策。《基辛格秘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角度，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基辛格如何就有关缓和关系的错综复杂、美国—苏联—中国三角关系以及核武器控制这些问题与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勃列日涅夫等会谈的情况。

詹姆斯·G·赫希伯格，《詹姆斯·B·科纳特：从哈佛到广岛以及核时代的形成》一书作者。

《基辛格秘录》向我们独特而引人入胜地展示了亨利·基辛格在与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交往时的外交谈判以及外交策略。这些几乎完全逐字抄录的副本是最原始和公正的记录，基辛格的中国和苏联伙伴的性格和倾向在这里展露无遗。《基辛格秘录》不仅是一本重要的书，而且真的值得一看。

雷蒙德·L·加思夫，前驻保加利亚大使、美国代表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1963—1973成员，《缓和与对抗：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美苏关系》一书作者。

ISBN 7-80595-465-8



9 787805 954650 >

ISBN 7-80595-465-8/I.289

定价：36.00 元

基辛格秘录

[美]威廉·伯尔 著

庞 伟 译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亦 夫
封面设计:艺 术

基辛格秘录

[美]威廉·伯尔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25 插页:64 字数:580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5-465-8/I·289 定价:36.00元

序 言

本书是首次出版以介绍亨利·基辛格与中国及苏联首脑的部分会谈记录为内容的书籍,这些记录属已解密部分。当时的基辛格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并随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期间任国务卿。尽管还有许多内容仍被保密,但现有的极其详尽的谈话记录仍然可供读者掌握一手材料以了解现代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等与基辛格,这个美国现代史上倍受赞誉和批评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是怎样互相对话和影响的。

这些谈话记录之所以现在倍受注目,正是因为其揭示了在冷战这一重大历史时期的主要历史人物们在政策和外交上的相互影响。当时尼克松政府力图缓和美国与其强大对手——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要与前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尼克松、继任总统福特及基辛格都对中苏推行一种积极政策,一方面想尽量减小未来爆发直接冲突甚至核战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和苏联处于互相敌视的状态,因此,尼克松—福特政策努力使美国与中苏都发展一种亲密关系,企图让美国的影响尽可能凌驾于北京和莫斯科之上而维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这样,谋求发展北京、莫斯科同

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的“三角外交”，就成为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本书中的这些已解密的谈话内容正可以揭示出基辛格是怎样努力实施这种政策的。

很少有象基辛格那样声名远扬或臭名昭著的国务卿。当基辛格还是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时候，他就是《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经常带着一群女演员出现在一些晚会上。他阿谀奉承的天赋使得他大大赢得了媒体的支持和注意，而他也以“高级行政长官”的匿名方式有选择地向新闻界透露点消息或指示。基辛格发现他的声名远播对巩固其声望十分有利，但尽管他对自己成为公众焦点津津有味，却不愿他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总统顾问的工作成为公众评审的对象，他对于美国政府及自己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决策和谈判的个人观点，以及他与外国领导人物的联系，都有很多是不为人知的，而基辛格也正愿意这样！①

严格保密是基辛格保持政策控制和外交策略空间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行政保密是二战以来华盛顿机构的传统惯例，但基辛格把这一传统惯例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不论是“地下管道”的信息还是有关总统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他对这些机密文件从存放到保管都实行严密的控制。他相信严密控制关键的、敏感的信息，对在外交策略上出奇制胜是非常必要的，并且还可以防止各种谈判对手识破欺骗性的声明，从而保证白宫的政策控制和赢得外交胜利。②政府中任何对新闻界的泄密总使基辛格勃然大怒，为了找出并惩罚泄密者，他甚至荒唐地窃听下属官员与新闻记者的电话。实际上，为了尽力减小泄密的可能性，保证白宫的政策控制（甚至有时为了保护尼克松本人不泄密），基辛格的职员们都定期

准备好处理过的官方会谈记录以供散发给各有关机构。③

在成为国务卿以前,基辛格禁止懂得汉语或俄语的国务院专家参加高层次的美国与中、苏的会议。因此,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与毛泽东和勃烈日涅夫会见时,都不得不完全依靠中国或苏联的翻译人员,并且无法检查美国的政治声明在多大程度上被准确地翻译出来,或者一些细微的差异是否都已被双方明确。显然,基辛格宁可忍受这种困难和不便也不愿冒险将会谈机密落入政治对手的手中。④

基辛格在白宫和国务院的六年中,非常成功地控制好了行政保密,但南亚危机中的文件泄露及耸人听闻的关于他对其国家安全会议助手的窃听事件的暴露却是重大例外。福特竞选连任失败后,基辛格决定继续严密控制其文件,这主要是为了维护他离开政府后的名声。⑤因此,1977年1月,当他离开国务院时,他将其收集的大量白宫和国务院文件转移了一部分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一举动使基辛格得以继续使用文件来写回忆录,但仍然排除了公众对这些文件的接近,公众只能在2001年或他死后五年看到这些文件。总之,只能在以后。尽管基辛格在职期间经常与国会发生争吵,但信息行为自由法(FOIA)的漏洞使他在离职后仍受到宪法保护。由于FOIA对行政机构的文件实行保护,而基辛格又决定将其文件保存于国会图书馆,这样,大量的机密包括他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时的重要电话记录就都封存于他的文件中,并与要求探知的历史研究者、新闻记者及广大公众隔绝开来。⑥

虽然最全面的反映尼克松—福特时代的外交政策的政府记录被基辛格个人控制而对研究者们形成了一个故意的障碍,但是政府机构和档案保存处仍然掌握了基辛格有关尼克

松—福特外交政策的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例如，国家档案保存处就保存有尼克松白宫国家安全文件，其中包括了基辛格的办公文件。无疑，这些文件是基辛格保存在国会图书馆的部分文件的副本。美国国家档案馆现在正逐一打开尼克松国家安全文件，^⑦最终，随着一系列的机密被解密，所有有关记录将得以昭示，包括基辛格对尼克松的日常汇报简要、基辛格和尼克松与国外首脑的会谈记录以其他他们的“地下管道”资料等等。^⑧此外，感谢方便价廉的影印的运用和行政合作的需要，基辛格当年的亲近助手也拥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基辛格与外国首脑的会谈记录，国家档案馆和国务院也正在开启类似文件，这就更加保证了一些重要文件早日得以昭示的可能性。

基辛格的助手之一是温斯顿·洛德，他在布什当政期间曾任驻华大使，又在克林顿时期任国务卿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洛德自60年代在对外政策机构工作后，于1969年他32岁时加入了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成为在对华政策上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和左右手。洛德在美中会议上记笔记、做记录，为“地下管道”写信息，为晚餐会议选择合适的美酒与照明。虽然他在1973年5月得知基辛格为了查明是谁在1969年泄露了柬埔寨爆炸事件而支持联邦调查局(FBI)窃听他的电话时，他仍然选择了留在而不是离开这个机密外交的首脑机构。^⑨基辛格1973年9月出任国务卿时，又任命了洛德为外交计划小组(PPS)的主任，在PPS，洛德继续在对华政策上发挥了中心作用，并积累了大量高度敏感的文件，这些文件清楚地揭示了基辛格在七十年代对华关系中的种种举措。

在法定的对过去文件解密的权力下，国务院在国家档案

馆已开启了洛德的 PPS 文件中所有的基辛格的谈话记录,这些记录对本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资料来源。依据 FOIA(信息行为自由法)条例,国务院还将基辛格其他共事者和有关部门档案保存处的另外的基辛格会谈记录进行了解密。目前,从 1972 年至 1973 年,即美苏关系缓和进程达到顶峰的时期,基辛格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会谈记录仍被密封,但从 1974 年到 1976 年,即美苏关系又处于紧张状态并开始削弱时,其间的有关会谈记录已被国务院公布。这些详尽的记录记载了基辛格与苏联首脑各方面的讨论,包括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对话(SALT II),欧洲地区的安全与合作会议,经济合作和安哥拉形势。总结起来,国家档案馆洛德的文件记录和国务院公布的有关记录为当时基辛格努力推行三角外交提供了有力的事实证据。

这些记录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提供的详尽细节。在基辛格之前,对政府高层会议记录的详略要求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会议记录通常也是较详细的,但总统级别的会议却没有达到逐字记录的必要程度。^⑩基辛格对过去的这种记录极为不满,并且坚决认定只有完全详尽的、任何细微差异也不被忽略的(即使是当时美国翻译不在场)记录才适用于现代的政治决策甚至是将来的回忆录撰写。因此,他让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助手——温斯顿·洛德、彼得·罗德曼及其他人,共同做好会议笔记和详尽记录,把会议的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不仅要有谈话内容甚至还应包括当时的气氛以及动作,比如勃列日涅夫在会议室内来回踱步或者邓小平使用痰盂的习惯性动作。

有了如此详尽的记录,这些记录才得充分反映基辛格的

个人特色——博学、自负、考虑周全而又敏锐，阿谀同时伴着欺诈，自嘲的幽默以及讥讽不在场人的嗜好。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独立的基础来评价作为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基辛格，从而，我们就可以不仅仅依赖于他本人关于尼克松政府的回忆录，即《白宫岁月》和《动乱年代》。在很多方面，这些解密内容虽然在许多方面证实了基辛格回忆录中关于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 1972 年至 1973 年间的会谈记录，但同时也证明了基辛格的回忆录仅仅描述了三角外交的部分内容，这激发着我们去探寻基辛格究竟隐去了哪些其它内容。最重要的是，这些记录记载了基辛格在 1973 年企图与北京达成默契的战略“联盟”而付出的持久甚至有时有点冒险的努力，包括他没能说服中国同意在中美首脑间设立直接电话热线。此外，这些记录还戏剧性地增加了我们对基辛格在福特政府中所扮演角色的了解，^①而这些是在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同时，基辛格与邓小平、毛泽东、勃列日涅夫及葛罗米柯在 1974—1976 年的会谈记录，对评价这些年的关键性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了把这些记录系统条理地编辑起来，本书开头将作一个内容介绍，概览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成立前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他与尼克松之间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两人为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而对发展美国与原敌对国家之间关系所做出的共同努力。尽管他们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与北京和莫斯科利益一致，但在越战中仍存在很多重要的矛盾和冲突。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美苏缓和关系并建立包括武器限制和经济合作的“战略关系”，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使美国包容苏联并避免将来的核战争危险，甚至与中国建立

一种新关系也是这种包容战略的一部分。由于中苏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结束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将有助于美国凌驾于苏联之上,整体加强美国的力量。

内容介绍之后,本书又分九章来登载基辛格从1971年到1976年与中苏首脑的会谈记录和他与其下属就对华对苏政策的讨论。每章都包括介绍性的文字资料以使文件记录按历史顺序有条理编辑,而且每一个文件记录都注明了相关参考资料来源以明确出处。总的来说,我几乎是把所有记录整个再现出来,一些重要的记录,例如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的谈话,都是全文刊载的,但另有一些记录十分冗长,考虑到为了尽可能全面展现基辛格在建立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提供最具代表性的材料,避免使武器限制和其他谈判类的记录显得纷繁复杂,有些文件仅予部分刊载,而被删掉的部分则加以如实概要,对有些特别重要的记录还附以摘录。对那些不仅仅满足于概要和摘录的读者,国家安全事务档案馆将把本书中仅刊载部分或因种种原因未收录进来的记录全文登载在其万维网(www)上。^⑫

本书第一章概览了1971年后进程加速的中美建交和美苏缓和。其间尼克松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会谈摘要揭示了白宫积极向北京和莫斯科靠拢的动机在于广阔的战略意义和政治利益。有关基辛格—多勃雷宁会谈的“地下管道”记录表明了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新对华政策的忧虑,而著名的1972年2月尼克松—毛泽东会谈和基辛格与中国外交官员秘密接触的记录则表明了苏联的“深感忧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策。1972年5月首脑会议后,美苏关系缓和显现出坚定的推进趋势,但解密文献表明,基辛格就苏联70年代

中期侵华的可能性警告过中国。

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的相互关系可能在 1973 年达到白热化程度；他分别于 2 月和 11 月两次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与中国外交官员进行了多次密谈。本书第二、三、四章就展示了基辛格多次到北京并不断努力使北京了解美苏谈判的情况和进展，甚至包括美国在中东十月战争中的政策情况。1973 年后的有关记录则显现出中美之间一些紧张和分歧的因素，基辛格发现很难让毛泽东和周恩来相信美苏缓和并不意味对中国不利，而他力图让中国参与结束高棉战争的谈判的努力也因双方的不信任宣告失败。

尽管到了艰难的时期，但 1973 年中美关系变化的记录仍表明，中美建立了更为正式的“联络”关系，而基辛格同时也在努力促成一种包容苏联的“默契的”中美关系。虽然 1973 年美苏关系达到高潮，但如果夸张一点说，有“苏联可能出兵中国及中国对勃列日涅夫的反华抨击表现出应战状态的记录仍使基辛格的忧虑与日俱增。到 1973 年底，尽管莫斯科对中美军事合作发出强烈抗议和警告，基辛格仍然向周恩来提出了设立中美首脑热线以便及时通知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攻击的建议，但中国领导却从未对此给予答复，不过双方的情报合作在此期间确有进展。

基辛格对中国提供帮助并不意味着放弃与苏联关系的缓和。第五章展示了基辛格于 1974 年 3 月与勃列日涅夫的谈判，谈判旨在达成第二阶段的战略武器限制协议（SALT II）（这是为尼克松政府时期的最后美苏高潮做准备），讨论双边经济合作；并且重新开始了未解决的欧洲地区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进程。但是，这些讨论表明美苏关系缓和已变得问

题丛生,除了尼克松政府即将下台的原因,仅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飞行器(MIRVS)就使得 CSCE 进程困难重重(苏联拒绝基辛格限制使用鱼雷弹头的提议),而基辛格成功地将苏联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又使得勃列日涅夫十分愤怒。此外,亨利·杰克逊(D-wash)又在发动游击战,反对美苏缓和,要求在国会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提供保障之前,苏联应该改革其移民政策。虽然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都不屑于把人权问题纳入美苏缓和进程之中,但他们还是对解决这种民怨问题采取了积极态度。

美苏关系中出现的紧张平衡了某种程度上说更为紧张的中美关系。第六章讲述了尼克松辞职,新总统上台,中国的周恩来的影响逐渐下降,邓小平的地位开始上升并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对话人之后,基辛格是如何在这种更困难的形势下努力加强中美外交的。尽管刻薄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基本“良好”,但有关记录却显示出台湾问题及随后的中国对美苏缓和的反感使中美关系在 1974 年“冷”了下来。不仅基辛格和国务院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激怒了北京,而且基辛格在外交上承认台湾所做的试探也证明了北京对台湾的强硬严格的政策不能容忍美国对台湾的保护,而对台湾的保护又恰恰是华盛顿一个既定的重要基本政策。此外,当初基辛格警告过中国来自苏联的威胁,但现在邓小平却反过来谨慎地告诫美国:苏联对西方的威胁更大。在基辛格 1974 年 11 月的访华中,毛泽东拒绝了与基辛格的会晤,这已表明当时的中美关系已处于停滞状态。

第七章描绘了 1974 年和 1975 年美苏关系的复杂景象。基辛格 1974 年 10 月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磋商为达成主

要的战略武器限制协议奠定了基础,几星期后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就此达成了一致。虽然谈判继续进行,但在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巡航导弹的地位问题上的分歧又使两者很难达成协议。另一个头痛的问题是经济缓和问题:记录表明勃列日涅夫对亨利·杰克逊一事持嘲弄态度,而基辛格也保证他可以压制住参议院对此事的批评,但是,基辛格仍然未能避免国会对经济合作进行限制,这部分是因为他缺乏对合作细节的注意,也可能是因为对苏联的信任态度本来就模棱两可。1975年7月,欧洲地区安全与合作协议在赫尔辛基最后达成,这标志着美苏缓和又达到一个高潮。但就在当月早期的基辛格与葛罗米柯的会谈记录显示:苏联对美国的核政策深感忧虑。此外,基辛格关于在第三世界开展“竞争”一说也预示着麻烦的来临。

第八章的记录充分证明了基辛格在1975和1976年力图转变中美日益僵滞关系的失败。虽然尼克松于1976年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外交承诺,但福特的总统竞选计划却使这一承诺难以兑现,因为不论是福特还是基辛格,都不愿因台湾问题而受到共和党右翼的攻击。(实际上,虽然基辛格仍被任命为国务卿,但福特为了自己的选举前途已不再让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推延无疑会激怒北京,并使基辛格积极谋求无外交承诺条件下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受挫。虽然基辛格相信北京仍需要华盛顿作为对苏联的抗衡力量,但北京更愿意看到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产生分歧。邓小平对美苏缓和的抨击,基辛格与毛泽东的艰难会谈,还有被基辛格称为“粗野”的中国举动都使得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日益明显而突出。福特总统的对华访问标志了两国关系的一个

短暂改善,而且中国也购买了美国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将可运用于军事领域。然而,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一块心病,而随着1976年1月周恩来和同年9月毛泽东相继去世后中国展开的政治斗争,基辛格和他的顾问开始疑虑中美未来的邦交关系。

中美关系停滞时,美苏关系也于1976年开始下降。第九章中关于基辛格1976年1月访苏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会谈记录表明:战略武器限制协议仍是两国之间的重要谈判问题,双方都做出了明智的努力来减小两国间的差异,而且可能实现一种“突破”。但由于害怕在选举年受到政治攻击,福特总统决定暂停这种进展,因此,以后的谈判就处于休止状态。然而,安哥拉内战的幽灵开始向美苏的战略武器限制协议投下阴影。基辛格用熟悉的地缘政治来解释这次内战而忽略其内在性质,并认为苏联在安哥拉内战中的行为导致了美国对苏联的不信任——而这超出了美苏缓和所能容忍的范围。但他对勃列日涅夫的抗议无济于事。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拒绝谈论安哥拉。为了对莫斯科表示警告,也为了反击当时最有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尔德·里根的进攻,基辛格的言论变得高亢了。他开始拥护强硬的反苏路线,美苏缓和的前景由此黯淡不定了。

文件记录的种种细节清楚地再现了美国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对外关系。虽然美国的会谈记录本身并不能说明当时参与者的深层动机和决策过程,因为还需要更多的中国、苏联及美国的档案文件来共同说明问题,但是,它们至少提供了初步了解尼克松—福特时代外交政策的基础,尤其是基辛格对美国外交的引导。^⑬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记录证实了他

们对基辛格的想法——一个精明的制衡国际力量的外交家，还有些读者却可能看得更长远，认为基辛格只是美国走向其不再成为世界中心的后帝国时代中的一个过渡人物。^①有人也许并不认为基辛格是个外交家，而是个徒劳无功、权力欲极强的阿谀陷媚者，甚至是个听任人权滥用并有罪于印度支那战争的反革命者，但又有人会认为他是个极权政府的姑息者，但无论怎样，一旦看了本书中的记录材料后，批评者们也许该宽容一点，而吹捧者们则应尖刻一点。不论现在人们对基辛格有何看法，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始记录会公诸于众，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重要人物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备 注

在本书所有的记录材料中，全部中国名字最初都采用的是韦德—贾尔斯译法，但自从准备文件以来，汉语拼音成为标准的翻译法。在中美关系专家的建议下，也为了使全书保持一致，编辑将韦德—贾尔斯译法全部改成了拼音译法。例如，原来的“Peking”或“Chou En-lai”都被替换成了“Beijing”和“Zhou Enlai”。在此，我还应感谢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健先生及里兹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里曼·米勒·保罗 H 先生，他们为大量的中国名字的正确翻译提供了帮助。

同样，为了使本书清晰连贯，非文法的变化——包括标点、区分号等等，也都统一予以修正。插入语的内容是原始资料中的评论和事例，而括号中的内容是本书加入的评论和解释。

在少数地方,发言者的名字被扩大以示醒目。

注 释

- ①关于基辛格的成名,哈佛及政府机构先后都有所研究,可参见《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1992)和罗伯特·D·舒尔茨辛格著《外交博士亨利·基辛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关于美苏缓和的全面研究以及对基辛格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精辟分析,参见雷蒙德·加思夫著《国际关系缓和与对抗:尼克松到里根的美苏关系》*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华盛顿:布鲁林斯出版,1994),弗朗思·斯库尔曼著《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宏伟蓝图》*The Foreign Politics of Richard Nixon: The Grand Desig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1984),这些连同在嘉登·A·克雷格和弗朗西斯·L·洛文汉姆主编的《外交家,1939-1979》一书中发表的约翰·L·加迪斯著《力挽狂澜:基辛格的政策才能》(普林斯顿,N·J: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第564-592页,都提供了深入的分析(尽管其各有鲜明的个性)。
- ②“地下管道”是指仅供尼克松、基辛格及他们的亲近人员察看的有关与外国政府对话的记录,基辛格称之为“地下管道”或“总统通道”文件记录,这样尼克松和基辛格就把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料与国务院及其他机构隔绝开来,参见艾萨克森著《基辛格传》第205-209页。关于基辛格对泄密的愤怒及窃听的决定,参见上书第212-227页,哈雷森·E·萨里斯伯利《无忧无喜:纽约时代及其形势》*Without Fear of*